

研究議題

台灣的工業化與均等：
鉅視過程觀點的檢討與再分析*

蔡明璋**

* 這份研究獲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支持(計畫編號: NSC 85-2412-H-005A-004; 86-2412-H-005A-002)，謹此誌謝。

**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中文摘要

這篇文章檢討了兩個有關台灣工業發展與均等化的理論。整合理論強調台灣工業化的空間分散模式，有效的將農業區域納入，整合到現代化的經濟體系中而產生社會的均等；相對的，國家主義農業理論調台灣國家強制的擠壓並轉移農業剩餘到工業部門，造成農工部門(階級)的不均等。這兩個社會學分析的特色是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均等化的社會過程，給予相當適當的關注。以這兩個理論為基礎，我們提出一個整合的鉅視過程架構，釐清戰後台灣工業化導致社會平等的過程，並指出社會流動體系的塑造，是重要的中介因素。這個中介過程的因果架構也提供給未來的社會流動研究另一個不同的取向。

關鍵字: 台灣社會，工業化，均等化，農業，社會流動

工業化與均等化是台灣地區戰後經濟發展過程最重要的特徵。在回顧這段時期台灣的發展經驗時，一份重要的研究所作的結論是：「台灣的經濟發展使貧窮者和富有者一樣獲利。二次大戰之後財富的重新分配，和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多少解釋了貧窮者經濟情境的相對改善。強調農業和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策略也使台灣在較為平等取向的成長路徑上發展。」(Ho 1978:146)。

對台灣工業化成功的研究，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同時，也衍生出一個「發展型國家」理論(雖然不一定專指台灣國家)，澄清了國家相對於其他經濟因素在發展過程的重要角色。¹比較上而言，均等化過程的分析得到的關注就沒那麼多，對台灣的均等化研究，也沒有發展出類似「國家理論」那樣的系統化的解釋觀點。以往的一些討論僅是很分散的列舉相關的經濟與政治結構因素。例如教育水準(人力資本)的提高，國家支出結構的改善(國防支出的減低)，人口成長率的下降，企業的規模特徵(中小企業量上的優勢性)，產業結構的轉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等因素(Kuznets 1979 ; Riedel 1988)。

Greenhalgh (1988)試著在這些結構因素上架構出一個地緣政治的理論，她指出，台灣的均等化(以土地與收入分配作為指標)的兩個主要促成因素是土地改革與勞力密集外銷產業。但是後兩者並非是在台灣國家自主性的政策所完成的，而是來自國外的壓力。Greenhalgh的思考取向，企圖為台灣的均等化的解釋，

¹ 參看鄭為元(1999)的論文對這個議題的討論以及所引的相關文獻。

提供一個世界體系取向的理論建構，在這個脈絡下，她正確的指出了美國角色的顯著性。同時，她的論點有助於研究者清楚的辨認國家在工業化上的重要角色，但在均等化上，國家影響的比重並不是那麼大。就因果解釋的延伸性而言，Greenhalgh的分析其實是將台灣的均等化的原因探究，進行「外部週延性」的加強。所謂的外部週延性，指涉的是在解釋社會體系的結構特徵時，將外於某種理論邏輯的因素考慮進來。Greenhalgh相當依賴地緣政治與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很自然的會將美國作為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霸權國家對台灣的影響加以強調。這樣的理論化充實了因果的解釋。但是，「內部細緻化」的工作則被忽略了：這是指對社會過程的因果的細部說明，特別是對鉅視特徵的因果關連之間的機制更清楚的呈現。對社會學而言，較細緻的社會過程分析，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外部延伸性的分析工作。

對解釋台灣社會的均等化有興趣的研究者而言，僅是指出一些鉅視的結構條件(世界體系的關係與位置，或工業化的效果)並不令人滿意。因為缺乏經濟活動運作的過程分析，很難充分了解這些關係模式是以何種方式運作，而能產生均等化的效果。簡言之，僅是指出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對產生均等化的實質過程再加以描繪，這種取向的分析比較有助於我們了解台灣發展模式的特殊處。這種銳利的過程分析，其實是一種歷史社會學的實踐(Abrams 1982)。從這個過程分析的取向出發，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解釋觀點關注到台灣均等化與發展問題。在過去的台灣發展研究的文獻中雖已有提及，但可惜未能從

社會學的角度上做較詳細的分析、討論與整合。這篇評論性的文章企圖彌補這個缺憾。第一個觀點是工業離心化理論(the industrial decentralization theory)。這個理論強調台灣工業化活動特殊的空間分散模式，藉著將農業區域有效的納入，整合到以工業發展為基礎的現代化經濟中。第二個觀點是國家主義農業理論(the statist agriculture theory)，它強調台灣國家採取的農業發展策略，有效的促成了農工部門資源的轉移，但是對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的部門，直接造成不利的發展，也增加了社會的不均度。這兩個社會學分析的特色是，對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的過程問題，特別是在部門或社會團體的層次(相對於較廣泛、一般性的整體社會特徵的描述)，均給予相當適當的關注。但兩者使用頗為不同的分析架構，也指出相異的結論。對於這兩個理論的爭論，值得進行必要的比較分析。同時，在整合這兩個理論時，我們試著以社會階層體系的變化作為主軸，進行內部細緻化的分析，我們認為從階層觀點出發，能夠有效的與這兩個重要理論產生過程分析上的接續面，這有助於我們對戰後台灣發展所呈現的均等現象進行社會學的理解。

一、工業化，社會流動與均等

工業的發展與社會流動和平等的關係，是社會學關切的議題。但工業化如何影響流動並減低不平等，這個因果過程的機制在以往研究中並沒有很確定的結論(Tyree et al. 1979)。以工業化國家為樣本的跨國比較研究，發現工業化程度和社會流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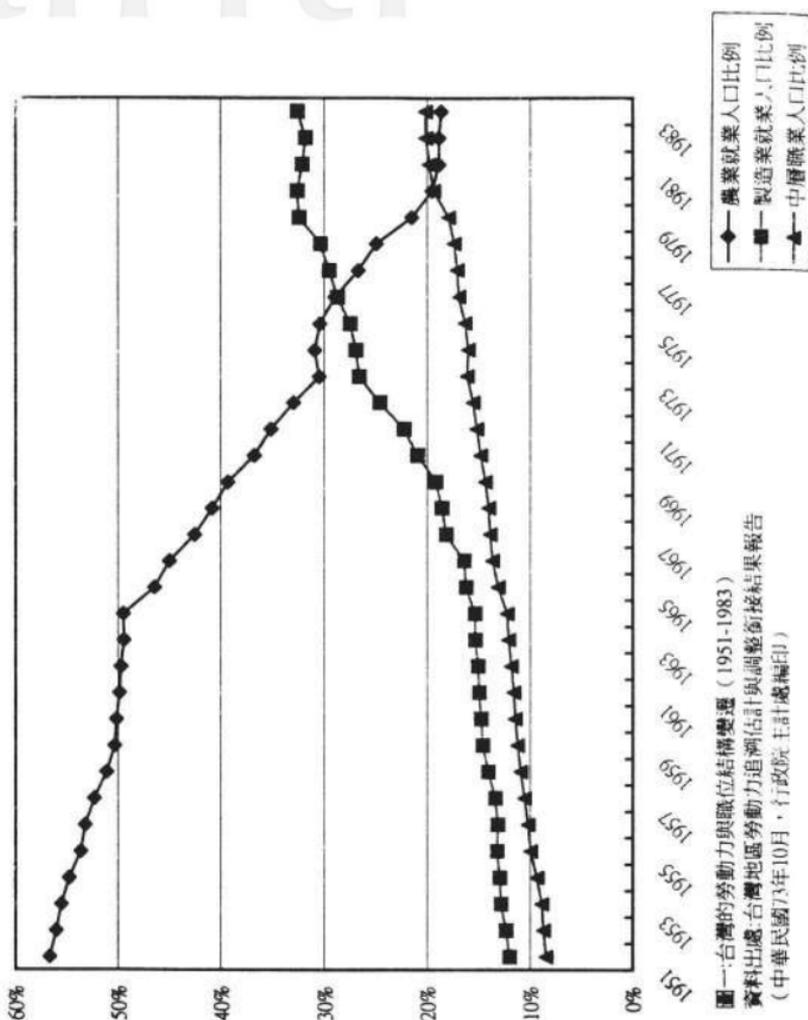
低度相關的證據後，甚至質疑社會流動是否一定要藉助工業部門的優先發展（Hazelrigg and Garnier 1976）。而在低度發展國家中，服務部門的過度擴張，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則有密切關係（Evans and Timberlake 1980；Fiala 1983）。Fiala(1987)的研究提供明確的証據，指出製造業部門在勞動力結構中的比重，是解釋這類國家的社會均等的顯著因素。不過這些跨國性的關係分析，並不能夠完整的觀察到一個工業化中的社會在獲致平等的過程，演化路徑很難從橫斷面的資料中顯現出來。

Mendels(1972)從演化觀點解析「原型工業化」變遷的模型，是較接近於我們的研究興趣。所謂的原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指工業化初期的鄉村工業：使用傳統的生產技術，但具有明顯的市場導向，在發展過程中有機會轉型成現代的生產/工廠模式。以英國的工業化經驗為例，他認為座落於農村的原型工業以紡織工業的形式出現，具有的重要意義是提供另一種工作給季節性勞動者。相較於已有長期發展的農業生產，原型工業的勞動生產力不一定比農業高（p. 242），但是能夠提供更多的職位而改變階層體系的結構（更多的工作空缺）。原型工業吸引的農村勞動者，大致上是農村的低層階級（沒有土地的佃農子女）。對佃農或自有土地的農民階級而言，原型工業的機會成本仍然相當的高。²

² 限於篇幅，我不再進一步討論原型工業的資本與技術來源。雖然Mendels指出西方社會的鄉村手工業傳統，可能有助於原型工業的出現，當然需要再配合來自都市的商業資本（Pp. 245-46）。

並非所有的原型工業都能強韌的存活下來，並且轉進成爲現代的工廠。這在進行「晚來的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低度發展國家而言，的確面臨了相當的困難(資金短缺、技術落後以及國際競爭)，國家政策的保護和鼓勵也不一定真正奏效。我們稍後會論及這個層面的問題，目前先就我們所關切的社會流動來說，在1950年代台灣，我們可以想像許多原型工業，以及製造業相關的工廠，在台灣的農村逐漸增加，並成爲一種「固定的職業」。所謂的固定職業，是指某種類型的工作，固定的在職位體系中佔有一定的比例，而且這些工作需要獨特的技術，在這些職位上的工作者因此帶有可以辨認的特質(包含資格、地位和報酬)(White 1975)。在1950年代，低度發展國家的農業就業者萎縮，是相當普遍的趨勢(特別是在發展程度較高者)(Kuznets 1982)，台灣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偏離這個趨勢。但是台灣農業勞動者比例的下降，從1951年到1970年的幅度爲20個百分點(請看圖一)，遠高於同一時期的國際平均水準。在同一時期，台灣的製造業產生的工作，也呈現長期上昇的趨勢，在解釋這個穩定的趨勢時，我們特別強調製造業工作在職位體系中的「固定」性格，亦即不論經濟景氣呈現或上或下的波動，台灣的階層體系大致上可以提供這些位置作爲流動的階梯。³

³在開發中國家，工作的「固定」性格當然不能過度的誇大或視爲理所當然，因此，這個固定化概念假設勞動者對某一個產業的「依附」，這並非是毫無問題的。在這段時期的台灣，這樣的依附通常不是那麼絕對。圖一的統計資料忽略了那些「一腳踩在農田，一腳踩在工廠」的農村勞動者的曖昧身份。在戰後一、二十年，自耕農家庭的這種雙重勞動者的傾向非常明顯，因爲農業所得常不足以支付全部的家計費用，特別是農地經營面積



較小的農民（1960年資料）（雷秉章 1968：8）。重建這個時期更細緻的勞動部門依附與轉型有其必要，但不是本文所能處理的（參考王宏仁 1999）。

在圖一中，我們也觀察到三個代表中間階級的職業的長期增加的趨勢{專業技術人員+行政主管人員+監督佐理人員/總就業人口}x 100%}。但上昇的幅度並不大。戰後台灣工業化的早期，中產階級的位置並未大幅擴張（參看蔡瑞明 1999）。最近的研究資料也顯示，這個階級（特別是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在台灣沒有像美國那樣經驗快速的成長（許嘉猷 1994；蕭新煌 1994）。這並非是質疑台灣的經濟轉型對職位體系的微弱影響。在工業化國家，甚至是在都市中，這個層級的擴張也不是很快。Thernstrom (1973:50) 研究波士頓市的階層的歷史變遷發現，白領階級在1880年至1970年的一百年間，才產生20個百分點的進展（從32%到51%）。簡言之，戰後二、三十年間台灣社會流動依賴的機制，是製造業首先提供的非農工作機會；各個產業中的中間層級職位的增加，則應是第二波的階層體系的轉變。⁴

製造業工作（或更廣泛的說，非農工作）的擴增，逐漸塑造出的階層體系，很像是歌譜上的「滑音曲調」（glissandos）：垂直流動在很長的小步階梯上進行，在社會階梯的兩端之間提供許多中間層級的位置，供更多的人口進行循環流動。這種滑音式的階層體系，不同於較為嚴格區分且只有少數階級構成的「間斷階層」（gaps）體系（引用Tyree et al. 1979）。並非所有的工業化發展均能塑造出滑音式的層級。比較而言，勞力密集產業

⁴王宏仁(1999)指出，1950年代的第三級產業中，約有50%是低級的服務業（相對政府部門的工作），這些邊際性的職業位置，並不能提供社會地位晉昇的管道，反而是製造業的工作是當時階級流動的主要選擇。王的論文對這個時期的階級結構與變遷提供值得參考的資料與討論。

的階層化效果較接近這個模式。相對來說進口替代工業通常使用資本密集的生產方式，跨國公司直接的投資產生的經濟依賴與對民族工業的衝擊——這兩種工業化都比較不容易產生滑音式階層體系，對社會流動及平等的效益較不顯著。

綜合而言，工業化產生的報酬分配模式，將農民拉出農村，放入所增加的非農工作，職位分化因而逐漸複雜，階級界線模糊的階層結構得以形成，這是促成流動與平等的主要機制。

二、工業活動的離心化與均等

(一) 農村工業：區域擴散的社會均等效應

相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部門雙元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台灣的發展經驗產生較適當的社會分配 (Barrett and Whyte 1982; Kuo et al. 1981)。在回答台灣的發展與均等化的正向相關的過程機制時，何寶山(Ho 1979, 1982)提出了工業離心化擴散的理論，他指出台灣發展過程中，工業生產在空間上較高的「自由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何寶山的區位學分析是從歷史的發展資料中指認台灣的均等化的特色。他蒐集的歷史資料顯示，台灣傳統農村有相當活躍的工業活動。日據時期台灣農村存有活躍的製糖、食品加工、紡織及其他簡單的化學品製造活動(Ho 1978:71-72)。何寶山利用日據時期的普查資料指出，1930年代台灣農村人口中約有四分之一從事非農的工作，而製造業雇用的

工作者當時也大部分集中在農村地區(63%)(Ho 1982:976-977)。這些製造業活動的分布，顯示了台灣農村接觸工業部門的經驗相當的早。就Mendels(1972)所謂的原型工業與農村的「選擇性親近」假設而言，台灣並不是例外。戰後的農村工業化不能看作是一個「全新」的趨勢。

但是這個時期的農村工業活動對台灣區域發展的影響程度須仔細的考量。農村的工業化活動，相對於都市的現代工業部門，大部分是屬於勞力密集的低技術製造業。在工廠規模，雇用員工及資本額方面，均明顯低於都市地區(除了製糖工廠外)(Ho 1979:84-85)。尚須注意的是，農村或都市的現代部門的工業活動，多由日本資本支配，傳統部門則是台灣資本的活動空間。後者的擴張有許多的限制。資本取得不易是重要因素。資金來源主要是由農村的儲蓄供給，但就當時的農業累積能力而言，這個來源仍相當有限。因此，技術水準偏低和資本不足的農村工業對農業地區的整體發展效果並不是很顯著。何寶山(Ho 1978:89)也保守的說，農村工業僅是提供就業機會，吸收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是較明顯的作用。甚至在這點上他亦有所保留，他認為對工業活動提供的技術訓練不應有太多的期望，因為當時「農業扮演雙重的角色：對其他職業而言，它是青年人供給的重要來源；它亦是許多人不再年輕時返回故鄉所能做的」。⁵農村青壯人口的流動，可

⁵ George W. Barclay,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p. 97-98, 引自Ho(1978:83)。

能使農業活動流失生產力高的工作者，雖然這個負面影響的程度不易估計。

在解釋台灣戰後的均等化發展時，或許要小心的評估殖民時期的工業基礎。一個經濟成長快速的社會，是否會出現不均等分配的傾向，與此一社會的發展初時的資產與收入的分配模式，會有很密切的關係(Riedel 1988)。但「歷史效果」的持續常不是一個定局，往後的發展與分配模式可能會將最初的趨勢逆轉過來。更緊貼的觀察經濟變遷的過程，會是比較穩當的做法。在這一點上，何寶山是相當的謹慎。不過，歷史的持續似乎是台灣農村工業活動的一個特徵。台灣戰後 1960 年的工業化空間分散模式繼續呈現反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特色。相較於西方工業化國家都市集中工業活動的趨勢，台灣的農村明顯的吸引了較高比例的工業，特別是起自 1950 年代中期以後。根據他的資料，從 1956 年到 1966 年十年間，台灣的就業雇用比率增加 5.3%，在都市地區，這個比率約在 5.5% 左右，而鄉村地區只有 3.8%(Ho 1979:81)。但是就製造業部門的就業機會而言，農村地區的年增加率在 7.2%，其他較都市化的地區約有 5.5% 左右(Ho 1979:80)。農村所佔的製造業人口在 1956 年為 37.2%，10 年後增至 41.3%。都市的平均工業規模仍然較大，資本密集的特徵也明顯，勞動生產力也較高。這些對比構成的雙元性，似乎延續了日據時期的情況。但台灣的工業的分散化，或是農村的非農活動的相對普遍化，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比較，的確很容易突

顯出農工部門之間，以及總體社會的均等化表現。⁶

何寶山也比較了台灣與韓國的情況，他指出韓國工業活動的空間分佈較為有限，集中在大都市(主要是漢城與釜山)的勞工一方面使農村地區相對的孤立，一方面也使早期的工業勞工的「移民」比較是長期性的，較少再轉回農業工作，普羅化的傾向格外明顯。1970年代，韓國中大型工廠常新設在非農村地區，而台灣農村則是持續的吸收中大型的工廠：在1971年，100人以上的工廠幾近半數座落在農村地區(Ho 1982:981)。這種不同的區位分散模式，與產業規模的大小或許有關。台灣的鄉村中小企業，需要的土地、人力與資本較小，也因為這個因素而較有彈性，再加上廣布的生產下層結構(充足的水電與方便的運輸)，所以不必集中在特定的都市地區，而能在都市的外圍運作，這對分散作用會有顯著的效果。另外，區位的一些便利處，例如台灣地理區域上平原集中在西部海岸，導致人口的密集，農村勞力(包括女性的勞動力)以及原料取得的方便性，也部分的解釋了台灣的工廠與農村連結的特殊現象(Ranis 1979:221ff)。Saith(1987)認為台灣比韓國較佳的下層基礎支持(包括水電、道路交通與教育)，與日本殖民時期的發展政策有關。韓國農村地區歷史性的低度發展趨勢，相對地增強工業活動的集中化，形成了非常強烈

⁶但這樣的農村工業發展路徑並非是台灣獨有的，日本在19世紀末期開始工業化，也經歷了相似離心化的過程，Saith (1987)有詳細的分析。

的無產階級化效應，將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緊緊的吸入工業部門，並切斷勞工與農村的連帶關係。⁷

如果我們接受Kuznets(1979)的論點，低度工業化國家的發展過程要避免不均等的陷阱，家戶的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是一個重要的機制，那麼工業分散化的事實，似乎正是為這個假設提供了重要的「過程」證據。易言之，何寶山的研究呼應了台灣農民收入研究文獻上一個重要的發現，即台灣農民的「非農收入」所佔重要地位，以及因此對鄉村貧窮的減緩作用。農家的非農經濟活動及收入，當然是在工業活動分散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發生。農業與工業部門在區位上的「連結」，解釋了台灣農村勞動者的家戶收入的多樣性，以及城鄉分配均等的結果。

(二) 對離心理論的一些批判

促成農民從事非農工作的一個重要結構因素，是台灣的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小農生產(或所謂零細化的農業生產)。Chinn(1979)分析1960年至1970年左右的台灣中部地區農家收入結構，他蒐集的資料指出，土地政策所導致的小規模農業經營，形成小農不易以勞力投入的增加而提高農業生產力。勞動與土地成本在農業生產因素中所佔的比重是下降的，而肥料與機器的投入則更為重要(雖然這些投入需要資本的支持)。不過整體而言，這段期間的農業活動收入是有增高，但是也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剩餘。小農制生產蘊生了一種推力，將農民推出農業勞動生產

⁷關於韓國的工業化發展及農村勞動力的普羅化的分析，可參考Koo(1990)。

之外。而同時在農村附近的新興的工業生產組織的特殊運作模式，則是形成一種吸收這些餘剩勞力的力量。Ho(1980)指出分散化的工業，避免資本密集傾向的成長模式，甚至在鄉村的大規模企業，亦雇用大量非技術工人，而小企業也能維持一定的生產效率。簡言之，如果農村的工業排除低教育者及低技術的勞動者，工業分散化理的解釋效力可能會受到限制。

一個較不同的論點是Low(1981)的研究所提出的。他比較非洲南部小國家(史瓦濟蘭與賴索托)與台灣的農業生產，並指出過度強調農村中非農工作的重要可能不正確，至少就他的非洲案例而言，正是因為農村勞動者轉至工業工作，反而使農業生產力下降，平均而言，農戶的整體收入並沒有改善。Low的論點是，台灣案例的特殊處其實是增加農業生產力的企圖並未被放棄。不過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南非洲的國家所能提供的工資應比台灣低，這當然對農村/都市均等化的助益很有限。

工業分散化的論點在指出了均等化的形成過程機制的同時，將台灣社會描繪成一個經驗快速成長、分化與整合的社會，避免大部分第三世界所遭遇的成長與不平等相伴而來的結構難題。但是，這個論點在強調台灣社會的轉型時，有幾個較隱晦但很重要的問題，似乎為這個取向的研究者所忽略了。(1)如果農村的多數農民靠著非農的工作機會與收入，才能維持適當的生活水準，其實暗示了農民處於相當危險的「依賴情境」，如果台灣工業經濟的景氣未能持續(雖然這並未在1960-1970年代發生)，農民收入和整體農業地區的蕭條是極可能的結果。(2)從農業部

門與工業部門的空間互動的角度來看，台灣的農村工業帶來的工業資本和就業機會，的確減輕了1960年代以後農村人口外移的勞力及相關資源的損失。但工業分散化的論點傾向於採取一種較保守的立場，低估了農村移民對農業部門的影響。都市對農村移民常有很明顯的「選擇性」——青壯年及高教育程度者較可能移往都市地區，追求較高的工資或較適合生活方式。持續的都市移民必然對農村地區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⁸ 分散化理論認為移民的效果是可以忽略的，這個立場並非沒有問題。(3)雖然長期的趨勢已顯示製造業不再是提供勞力密集的就業機會的主要部門；而服務業雇用了最多的勞動力，甚且有中產階級化的傾向，排除了低教育者及缺乏技術或訓練者的加入(蔡明璋1994,1996)。這個趨勢對來自農業地區勞動者的就業，可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值得未來的研究者注意。

整體而言，工業的空間分散理論指出，工業就業機會在區位上普遍的分佈，已成為穩定的結構特徵，新興的工業區繼續在都市之外提供就業機會。透過工業活動的反集中化這個機制，農村人口得以整合、納入台灣的經濟發展中(Speare 1992)。我們對這個理論已進行了必要的討論，也指出這個理論所呈現的事實與樂觀的分析，必須小心的解讀。

⁸ 當然，往都市移動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終生定居者，1960年代的一項資料顯示約有半數都移民再回到鄉村(Speare 1974)。

三、國家主義農業：

剩餘壓榨與農業部門的低度發展

(一) 農業資源轉移的政治經濟學

工業分散化的理論相當著重空間上的生產活動特徵，這是其分析邏輯的特色，但也因為在這個空間機制上的強調，而未能充分考慮社會生產關係與政治運作對均等化的影響。工業分散化論點不免狹窄的將分析觀點限制在農民所可以得到的非農工作機會，而不去質疑：為何農民必須依賴非農收入，而不能從農業生產中獲得足夠的利益？為何農業生產活動不能擁有自主性，而要受制於國家政策的限制？對這些問題不夠週延的思考，「空間化約論」可能因此產生危險的推論，認為均等化可以藉由觀察農工部門的空間互動來促成。這個狹窄的觀點需要加以檢討。相對於空間分散化—社會整合理論，國家主義農業理論的政治分析特別引導我們注意非經濟勢力在均等化上所產生的負面作用。

國家主義農業理論涵蓋了社會學及農業發展的研究，主要的論點是認為台灣農業部門乃是國家權力直接管制的一個資源創造部門，其角色是國家整體工業發展政策的墊腳石，藉著對農業生產和消費施以高度的政治控制，而擠壓出農業生產剩餘以供養國家支持的工業化政策(蕭新煌 1981; 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 1986; 柯志明 1996; 柯志明、Selden 1988; Moore 1988)。國家農業主義理論明顯的帶有政治經濟學意味，對農業部門的結構變化的分析，不侷限於工業農業的空間互動或互惠關係，而是

更深的挖掘出兩個部門深層的不平等交換關係，以及在均等化上產生的不利於農民的結果。其分析架構傾向於從社會階級和國家勢力的層面，觀察政治精英對農業政策的操作及企圖。

國家農業理論指出，台灣光復早期的農業政策，乃是國民黨的威權官僚國家直接干涉農業生產的運作，強制的榨取農業部門的剩餘，導致農業部門相對於工業的低度發展。這個資源不平等交換的論點並不是嶄新的發現。李登輝(1980)在分析台灣農業的歷史發展時，已指出農業部門資本流入工業部門的現象。根據李登輝的說法，農業資金的流出，主要是交付各項稅捐與規費給予國家；地租和利息，比較而言，則不是重要成份。但是在日本殖民時期，稅捐和規費反而佔了較小部分。農業剩餘和擠壓，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初期國家缺乏工業投資資金的情況下，扮演了決定性的替代角色。農工部門不平等的資源交換，僅是農業對工業化的貢獻之一，李登輝進一步提出兩個論點：(1)農業出口為戰後初期輸入替代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外匯，以購買工業機械與原料；(2)國內工業產品市場的保護政策，使農民購買較高價的工業成品。結果，「農業剩餘在雙重的榨取下，工業利潤大增，促進企業家階級的資本累積」(李登輝 1980:395)。

Park與Johnston在最近的一份研究(1995)指出，台灣農工部門互動對工業化的發展，不應侷限在對這兩個部門的資本關係的觀察，而應就農部門對工業產品(雖然是低級的資本財與消費品)的持續、有力的需求，而產生了所謂的「動態的外部性」(dynamic externalities)，來理解早期台灣工業轉化的成功。但這個論點並

沒有超出李登輝及相關研究的說法，但Park與Johnston提出了較為細緻的證據和完整的說明，他們從「需求面」的觀點出發認為，台灣的農業階級的單峰式(unimodel)結構，是以小規模農作為主要特徵(而非雙峰式的大地主—小農結構)，在較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下，對簡單的農業機器及其他生產要素有很高的需求，這些可以由散布在鄉村的勞力密集的小規模企業生產並供給。農業部門的消費需求，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⁹

國家主義農業理論點的啟發性在於勾繪出資源流動觀點所未加以強調的社會政治過程—台灣農工部門資源的流動模式，明顯的不是單純的市場運作機制所能解釋的。國家對農業生產結構的塑造(土地政策與小農生產)，對農業剩餘的徵收(租稅、價格控制及交易限制)，這諸種政治的干涉，反映著台灣威權國家的權力精英強力的支配機制，以及農民階級的弱勢、缺乏組織力量及不可避免受剝削的命運(柯志明 1996; 黃俊傑 1985; 蕭新煌 1981)。

國家主義農業理論的政治經濟學與明顯的階級分析取向，較整合理論更帶有批判性：農民和農業並未被納入台灣發展的利益分配中。不幸的是，以農業資源的剝削作為「晚來的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財政基礎，這樣的結構轉型是慣常使用的經濟發展策略。例如，柯志明與Selden(1988)指出，由於資本的缺乏，落後經濟的初期工業化所能選用的路徑其實有相當限

⁹ 比較而言，以往台灣工業發展理論強調的外銷導向經濟及「價格調整」的論點(例如Amsden 1985)，是忽略了這個層面的效應。

制，理想上的均等發展(農工部門)很難成為政策的選擇目標。工業化投資所面臨的收支平衡、通貨膨脹與經濟秩序不穩定常是最主要的政策考慮。因此，農民生產的剩餘常成為國家精英徵收的對象，以解決推動早期工業化時的困難。這樣的策略常是超越意識型態的影響，例如他們比較資本主義的台灣和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得到近似的政策運作(雖然實際的資源徵收方法不盡然相同)。在國家主義理論的觀察下，台灣工業的發展，以及作為一種原始積累模式，對農民階級的影響應再重新詮釋。對這個理論而言，農村工業化僅是使農村地區的衰落減緩而已，並未使農民經歷實質的發展。廖正宏等(1986:327-335)在1982年的一項農民調查報導了農業生產為主的農村地區(相對於農業生產比重較低的地方)，農民有較高的「離農意願」。這個時期一般農民對農業的「疏離」感覺，與國家對農業部門的榨取，兩者之間應有密切的關係(亦參考廖正宏 1977)。¹⁰

¹⁰ 金寶瑜(1989)對柯志明與Selden(1988)的論文有詳細的批評，不過其重心是擺在農工部門的資源是否可以做為馬克斯真正的原始積累概念的「操作化定義」。這篇評論與柯志明(1989)的回應，都沒有就社會均等的問題再進行討論。在柯志明與Selden(1988)的論文中，均等的概念主要是標明發展中國家政策的選擇方向之一，而台灣國家引導工業化發展並沒有以這個目標作為基礎(雖然我們的分析指出工業化的後果，而非工業化本身，減低了不均等)。其實資源轉移的一個重要效應是透過對農民剩餘的徵收，而壓低了他們應獲得的消費能力(柯志明 1989:43)。相關證據的收集似乎不是柯志明與Selden(1988)論文的主要工作。但在台灣農民的研究裡滿佈著這樣的資料(例如黃潤之 1959;雷秉章 1968)，這也意含了農民與其他階級的不均等的狀況。

(二) 農民的社會流動困境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民的資源條件的確是處於不利的地位，而與依附在工業或服務產業的社會團體產生出收入上的差別。從這裏，我們可以預測這個群體在社會流動上的困難。國家主義農業理論認為政治力量運作形成的不等交換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除了這個「政治」觀點之外，從「生產模式」的觀點來看，台灣的土地改革所產生的零細化農業，是農業生產收入的一個更有力的結構限制。在土地改革後的初期，小農制度是產生較低的社會不均(Ho 1987)。但弔詭的是，這僅是短期的作用，長期而言，此一制度的生產不夠規模與低效率，必然造成社會的不均等。國家的擠壓作用也許不必看作是始作俑者，但的確是使1950年代以來農民與其他階級的經濟差距趨勢更為惡化並提早到來。¹¹ 代間社會流動的研究亦指出，農民的階級自我繼承比起白領或藍領階級更顯著(蔡瑞明 1999)。本文認為，這是農民在國家主義農業制度下作為社會底層階級的代價。

台灣國家部門對農業生產要素及交換條件的控制，使1960年代中期之前的農民，大致上是呈現穩定的「原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進行自我剝削式的家戶生產，這是農村地區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柯志明、翁仕杰 1993)。回溯而言，這導致農村地區相對的低度發展，經濟生產剩餘的累積及生活水準的增進遲緩，與這個階級的生產特質有相當的關係。柯志明與翁仕杰估計，這類型農民在1980年中期仍約佔農業人口的27%。從另一個

¹¹ 謝謝黃樹仁教授提供這個有趣的論點。

角度來說，原型農民減少，意謂著農業階級的分化或異質化，許多新的農業勞動者不必似早期原型農民受制於國家的管制(例如肥料的配給與交換)。的確，在生產的主控權上，目前台灣農民已有較高的自主性。但是，分化後的農民階級是否因而掌握了更有利的生產要素而改善農業地區的發展？相關的研究指出，農民階級的分化對區域發展的效果不應抱持太過樂觀的看法。重要性逐漸增加的「小商品生產農」，可以在自由的價格市場中將農產品完全「商品化」(擺脫國家管制)，依靠現金作物，在市場中隨著需求變化而決定生產方向。但這樣的農民並不是最主要的類屬(約15.5%)。另外，利用雇工進行市場取向生產的資本主義農民，部分實則是基於家庭勞力的短缺，而非生產的資本主義化(暗示較高的資本化或技術化)(柯志明、翁仕杰 1993)。這種分化趨勢，部分原因是都市消費力的提高，及國家對農民施加控制力的減低(以避免不必要政治緊張)。但另一方面，農民本身的資本增加以及家庭中非農勞動力比率提高，也使得在農村地區的農民階級可以有較好的生活水準(Moore 1988)。

從國家主義農業的觀點來推論，農業區域的農民階級地位的分化，生產模式的多元化，並不同時意謂著農民階級的生產模式的彈性調整，或是能有效的提昇生產效能，反而是這個階級在面對農業生產累積不足時所不得不進行的因應。整體而言，不論生產活動的分化或不分化，農民所能獲得的農作收益，比起工業部門的諸種階級的工資，顯得較低且不穩定。經濟生產「市場化」的運作不一定對農民的利益有幫助。農民所依賴的都市工業工資

改善而增加的農業消費，不一定持續不變，以往政治保護下的農產品消費，在目前自由化/世界化市場開放的衝擊下，不可避免的將會處於更不利的競爭地位，這更暗示了農業部門的發展與農民社會流動的困境。

國家主義理論認為，農民階級面對國家強力的徵收，延伸而出的結果是社會流動的侷限，而增強了階級內的自我繼承，同時也強化了不均等的階層效果。但實際上，這樣的悲觀觀點並不是那麼的適合台灣發展的經驗。至少，農業人口的長期萎縮（參看圖一），暗示許多農村出身的勞動者不必無助的鎖定在農業部門中。

四、各說各話？兩個理論的比較與整合

我們所分析的兩個觀點，對台灣的工業化過程中的均等問題，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分析。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這兩組理論都對均等化的機制進行實質的過程分析，我認為這是非常有用的社會學「演練」（雖然工業分散理論主要發言人—何寶山—並不是社會學者）。從這個層面的分析呈現的經驗性資料，有助於研究者評估在獲得結論之前所進行的觀察和解析的適當性，我認為這是審視結論或整體分析邏輯的說服力高低的關鍵。對於社會過程只有模糊交代的研究，其實是暗示研究者對事實資料掌握不足，在這種微弱的基礎上，很難建構出有意義的論點。大致上，這兩個理論都避免了這樣的缺點。

表一列出兩組理論的基本特徵的對照。這個比較表的目的是使讀者更清楚的了解兩者所分析的「過程」究竟有何差異，以及如何導致不同的結論。

表一：工業分散化與國家主義農業理論的比較

	工業分散化理論	國家主義農業理論
1. 觀察與分析的對象	農業部門、工業部門	國家、農民階級
2. 主要社會過程	資本與勞動力的互惠交換	資源單向的流動，政治權力的支配，與對農民的剝削
3. 對社會階層的效應	工業化且均等化	工業化但不平等

首先，這兩組分析所觀察的對象並不相同。易言之，整個理論的解釋是在相異的出發點上進行。工業分散化理論強調的是「部門」的行為，特別是工業活動在(農業部門的)空間上的擴張。這樣的分析並非不適當，但暗示農業區域的工業化是一個相當有力的因素，農村會因這種地理擴張(或者是工業資本的散佈與農村勞動力的被吸收)，或者，藉著農村原型工業的延伸，而產生工業化以及勞動力吸收力強的階層體系。這樣的變遷觀點認為部門的利益並不是衝突的。不過，我們已指出可能產生的一些非意圖的結果，例如農民移民對農業經濟生產本身是不利的。相對的，國家主義農業理論比較傾向就階級進行觀察。這種觀察對象的差異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農村地區的生產模式的蕭條，以及國家與農民階級間的矛盾與緊張關係，而非工業分散理

論暗示的社會整合結果。在分析農業經濟時，工業分散理論比較模糊的(或較不經意的)處理存在於其中的兩個階級(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民)，農民被視為僅是一種工作或收入來源，並不是生產關係上的一個階級，在這點上，國家主義農業的分析取向是有其優點。大體上，部門的分析，以及常伴隨的區域整合觀念，未能有效的解析農村地區的諸種階級的可能顯著差異，這顯然是一個缺憾。

第二，觀察的對象不同，導致對主要社會過程的特徵和分析的差異。在工業分散化的論點中，資本和勞動力的關係乃是以互惠的方式進行，交換的一方對另一方都構成不可缺乏的互補角色。對於能夠進入工業部門的農業勞動者，或者可以如Max Weber所說的，是在市場經濟中擁有一個較佳的位置(相對於仍依賴農業經濟的「原型農民」)。農業經濟的蕭條，農村人口過剩，以及結構性失業的危險或許迫使農民勞動作此種選擇。同時，國家從農業榨取資源，的確是使農民遭遇到不平等的剝削，但這些資源的一部分也同時轉而扶助了台灣的工業化，分散在農村的工業活動應與此有關，這又減低農工部門的差異(雖然這個效果的實際展現不易測出)。¹²這個帶有辯證意謂的循環效果，是國家農業主義論點較不注意的地方。我認為國家主義農業觀點或許對這個層面的互惠交換不會有所質疑，但他們的問題顯然不在此。他們較有興趣的是促成農業經濟萎縮的原因，國家的支配和農業剩餘的強制性榨取顯然是不能忽略的政治因素。但他們的分

¹² 當然這些農村產業有不少是農家子弟出資的。

析似乎排除了農村的工業勞動者所能得到的階層位置及流動機會，而專注於農民階級的歷史命運與不幸，這對理論論述的簡潔化有幫助的，但也失去了更進一步的包容性分析的機會。¹³

第三，兩組理論在工業化結果上較少爭論，對均等化則有明顯的爭議。工業分散理論顯然忽略了農民階級在台灣經濟體系中長期以來的不利位置。國家主義農業理論在這點上提出了較具說服力的說明。但階級之間總是不平等的，這不是令人訝異的事實。的確，在跨國比較上台灣是可以呈現一些令人讚賞的證據，但這不表示社會內部的不均等是可以忽略的(蔡明璋 1996)。農民在台灣社會中的比重逐漸降低，目前的農業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的比率只有9.6%，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只佔2.9%，在1990年至1997年之間，農業的平均年成長率近乎停滯，只有0.32%。¹⁴這樣的發展趨勢會使農民這個階級在國家政策官僚眼中成為無足輕重的社會成員(工具價值取向支配著台灣的科技官僚，這個說法應離事實不遠)。當農民尚是一個顯著的社會階級時，他們的不平等自然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但是就政治上而言，目前從這個「少數」的階級發出的「不平之鳴」，很難得到權力精英的重視。就國家農業主義理論而言，在均等化議題上的研究，如何「逆向操作」，給予人口比重逐漸降低的階層的不平等一個更適當的理論位置，應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嚴肅問題。

¹³ 這樣的說法不免有一點農村的懷舊傷感(rural nostalgia)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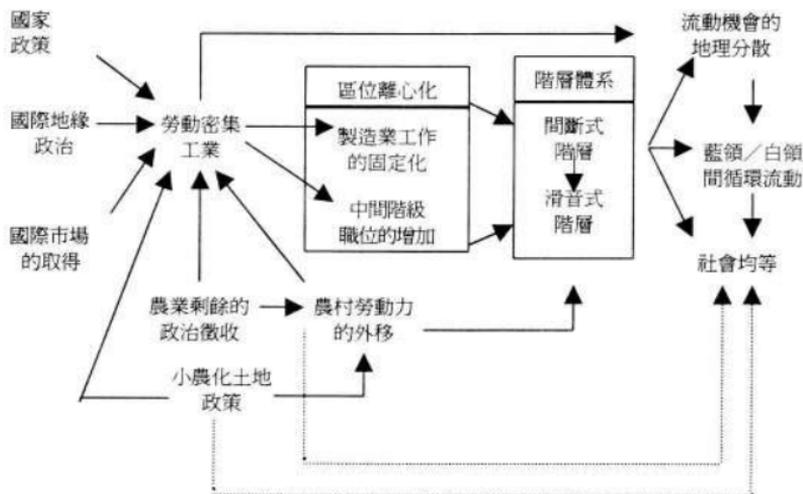
¹⁴ 行政院主計處1998年3月，中華民國統計月報，頁2-3。國家的農業與農地政策對農村土地的管制，也限制農業生產的彈性，並使農民的弱化更為

這兩個理論儘管存有上述三項差異論點，但並非完全互斥。特別是國家主義農業理論其實對我們理解原型工業在轉向現代工廠的過程，尤其是在勞動力流動上，提供了有別於新古典理論的解釋（例如W. A. Lewis的無限勞動力供給觀點），同時也質疑製造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必然超過傳統農業部門，以及低度發展地區國家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的高度彈性（甚至是在一個逼近基本維生水準的工資條件上）等論點（Lewis 1954；Ho 1972）。國家主義農業理論也提供了不同於古典市場理論的政治解釋，說明農業徵收，農業階級結構及工業化產品的消費，對台灣工業化產生的支持作用，這點也補充了離心化理論對這些問題較為不足的解釋。

這兩個理論在解釋工業化與均等的關係上，有一些可以互相支援的互補觀點。從理論架構整合的企圖做為出發點，圖二呈現的是一個台灣經濟發展與均等化的過程分析，將這兩個理論所提供的重要變項結合成一個完整的圖樣。請讀者特別注意的幾點是：(1)在圖下方從農業剩餘的榨取與小農化的土地政策可能有長期性的社會不均等效應，但僅是「可能」（因此以虛線表示），這是假設台灣的工業化發展不是如圖二上方的路徑進行。(2)資本的部門移轉與如何幫助工業化的完成，如何塑造出我們觀察到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包括國營企業與民間企業），限於篇幅，我們

明顯（謝謝審查者提出這個意見）。較詳細的討論，請參考蔡宏進（1992）、柯志明（1996）。

未能仔細討論。¹⁵ (3)圖二也概括性的提出國家政策、地緣政治因素與對世界市場(主要是美國)的依賴等重要的工業化支持因素,作為讀者的參考,這部分反映目前台灣經濟發展研究的重要結論(Amsden 1985; Tsai 1999; Wade 1990)。



圖二：台灣的工業化與社會均等的過程分析

我想強調的重點仍然不變：階層體系的結構是工業化和均等化的因果關係的中間媒介。針對這個中介過程的澄清，有助於我們了解台灣經濟發展與均等的密切關係。工業化在不同國家常

¹⁵ 在農業改革方面，國家是最大的贏家，農民顯然是被嚴重的剝削。但民間地主的資本如何利用土改政策所分配的股分與資本進行非農業投資，對這個議題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時期工業的興起。

以迥異的演化路徑出現（例如韓國與台灣的差別），導致的社會均等效果亦不相同。以台灣這個重要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作為例子，清理這些「中介變項」的實質過程，是本文的重要貢獻。

五、結論

在一個缺乏社會流動的社會，社會不平等是很難避免的結果。相對的，垂直地位的循環流動的機會愈高，意味著低層階級擁有較好的機會獲得較佳的工作職位與收入。因此，社會流動和社會均等的正向相關，是一個社會學通則。但問題是，有利於社會流動的階層體系是如何創造出來的？這篇論文藉著對台灣的工業化過程的分析與檢討，說明台灣的社會均等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少數的特殊例子。

社會流動的研究者在反省傳統的地位取得模型時，指出這個模型過度依賴對個人流動的決定因素和成就結果的觀察。這樣的研究策略很不幸的無法注意到社會流動的體系是社會結構的重要特徵，並且是影響個人的流動機會高低的重要原因（Tyree et al. 1979）。White (1975:335) 也明確指出，Duncan取向的流動研究只處理一個群體在特定時間內的「地位的改變」，而未顧及更重要的職位供給的結構，以及對流動的決定作用。這些批判引導本文進入一個鉅觀的結構變遷觀點，我們建議從工業化、經濟發展的路徑及國家介入生產的模式所共同構造出來的社會

階層體系著手，進行觀察影響個人流動的機會以及社會平等或不平等的結果。

台灣最近十年的社會流動研究仍然以個人地位取得的現象作為焦點（許嘉猷 1990；謝雨生、余淑娟 1990；孫清山、黃毅志 1995；吳乃德 1997；蔡瑞明 1999）。未來的經驗研究應可以伸展到本文提出的鉅視結構過程的分析上。但是我們再次提醒讀者，在工業化—社會階層—社會均等的因果關係上，有很明顯的跨國差異，我們所提供的整合模型是以兩個理論為基礎架構出來的，不是作為概括化檢證之用。對於有意進行這個取向的研究者，我們開始了另一種嘗試，並提供了一個極有用的參考架構。最後，這個架構的時間參考點，是戰後工業化的初始時期，在最近一、二十年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方向（後工業化與全球化）對社會流動體系的影響，在我們的模型中未能有效的納入，這亦是關心台灣社會的均等現象的研究者應加以注意的重要議題。

參考書目

王宏仁

1999 〈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6:1-35。

李登輝

1980 《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台北:聯經。

吳乃德

1997 〈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137-67。

金寶瑜

1989 〈農工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從評〈原始累積、平等與工業化〉開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63-77。

柯志明

1989 〈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79-91。

1996 〈農民、國家與農工部門關係:台灣農業發展過程中家庭農場之存續與轉型(1895-)〉。徐正光、蕭新煌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東大。

柯志明、翁仕杰

1993 〈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2:107-50。

柯志明、Mark Selden

1988 〈原始累積、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台灣為案例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51。

孫清山、黃毅志

1995 〈教育、收入與社會資源和階級取得過程之關聯〉。頁151-182,刊登於《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台中:東海大學社會系。

許嘉猷

1990 〈台灣的階級流動及其與美國的一些比較〉。《中國社會學刊》14:1-30。

- 1990 〈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台灣與美國實証研究之比較〉。頁21-72，刊登於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
- 黃俊傑
1985 〈光復後台灣的農業農村與農民：回顧與展望〉。頁237-96，刊登於中國論壇輯委員會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社。
- 黃潤之
1959 《台灣之稻作農家經濟》。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廖正宏
1977 〈台灣農村勞力移動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28:151-91。
- 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
1986 《光復後台灣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雷秉章
1968 《台灣之農家經營問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蔡宏進
1992 〈台灣近代工業化與都市化對農地利用與問題之影響〉。頁323-42，刊登於陳秋坤、許雪姬編《台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
- 蔡明璋
1994 〈地區家庭收入的決定因素：區域階層化的初步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231-56。
- 1996 《台灣的貧窮：下層階級的結構分析》。台北：巨流。
- 蔡瑞明
1999 〈台灣、美國與日本社會流動的結構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2:83-125。
- 謝雨生、余淑媗
〈台灣的社會階級及其流動〉。《中國社會學刊》14:31-63。
- 鄭為元
1999 〈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1-68。

蕭新煌

- 1981 〈台灣地區農業政策的檢討與展望:事實與解釋〉。朱岑樓編《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台北:三民。
- 1994 〈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台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頁73-108,刊登於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

Abrams, Philip

-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lice

-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78-106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ett, Richard E. and Martin King Whyte

-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1064-89.

Chinn, Dennis

- 1979 "Rural Poverty and the Structure of Farm Household Inco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7:283-301.

Evans, Peter B. and Michael Timberlake

- 1980 "Dependence, Ine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Tertia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531-52.

Fiala, Robert

- 1983 "Inequality and the Service Sector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 Reanalysis and Respec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421-28.

- 1987 "Labor Force Structure and the Size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in Countries, 1960-8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1:403-22.

Greenhalgh, Susan

- 1988 "Supranational Process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p.67-100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edited by 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rmonk, NY: M. E. Sharpe.

Hazelrigg, Lawrence E. and Maurice A. Garnier

- 1976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Access to Occupational Ranks in Seventee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498-511.

Ho, Samuel P. S. (何寶山)

-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8:77-96.
- 198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Industrial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0:973-90.
- 1987 "Economics, Economic Bureaucracy,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cific Affairs* 60:226-47.

Ho, Yhi-Min

- 1972 "Development with Surplus Population—the Case of Taiwan: A Critique of the Classical Two Sector Model, à l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210-35.
- 1980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Its Distribution Implic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8:321-41.

Koo, Hagen

- 1990 "From Farm to Factory: Proletarianization in Ko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669-81.

Kuo, Shirley, W. Y., Gustav Ranis and John C. H. Fei

- 1981 *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Boulder: Westview.

Kuznets, Simon

- 1979 "Growth and Structural Shifts." Pp.15-131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edited by Walter Galens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he Pattern of Shift of Labor Force From Agriculture, 1950-1970." Pp.43-59 in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Sir W. Arthur Lewis*, edited by Mark Gersovitz, Carlos F. Diaz-Alejandro, Gustav Ranis and Mark R. Rosenzweig.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rwin.

Lewis, W. Arthur

-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22:193-197.

Low, A. R. C.

- 1981 "The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Farm Incomes and Production: Taiwan Contrasted with Southern Af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9:741-47.

Mendels, Franklin F.

- 1972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241-61.

Moore, Mick

- 1988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Agriculture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Pp. 113-52 in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Gordon White. New York: St. Martin.

Ranis, Gustav

- 1979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p. 206-62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edited by Walter Galens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ark, Albert and Bruce Johnston

- 1995 "Rur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Externalities in Taiwan'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4:181-208.

Riedel, James

- 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Pp.1-38 in *Achiev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edited by Helen Hug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th, Ashwani

- 1987 "Contrasting Experiences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re the East Asian Successes Transferable?" Pp. 241-303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Employment in Asia*, edited by Rizwanul Islam.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Speare, Alden Jr

- 1973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302-19.

- 1992 "Taiwan's Rural Populace: Brought In or Left Out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Pp. 211-33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New York: M. E. Sharpe.
- Thernstrom, Stephan
- 1973 *The Other Bostonians: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Ming-Chang(蔡明璋)
- 1999 "Geopolitics,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in Taiwa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1:101-09.
- Tyree, Andrea, Moshe Semyonov, and Robert Hodge
- 1979 "Gaps and Glissandos: In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24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10-24.
- Wade, Robert
-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 C.
- 1975 "Chains of Opportunities." Pp. 335-55 in *Social Mobility*, edited by A. P. M. Coxon and C. L. Jone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quity in Taiwan: A Review of Macro-Process Theories

Ming-Chang Tsai

This review essay examines two arguments over social equity in Taiwan's postwar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contends that the spatial diversification of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corporated the rural areas into the modern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generated social equ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tist agriculture theory argues that the state transferred agricultural surplus to support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us produced inequality among the r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We discuss the two competing theories and suggest that the system of social mobility produced by industrialization is a vital element in explaining equity on this island.

Keywords: Taiwanese society, industrialization, equity
agriculture, social mobility